



湖北省学术著作

Hubei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出版专项资金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儒林外史》学术档案

甘宏伟 白金杰 主编

卷外篇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

Hubei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出版专项资金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儒林外史》学术档案

甘宏伟 白金杰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学术档案/甘宏伟,白金杰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0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陈文新主编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307-20084-5

I. 儒… II. ①甘… ②白… III. 《儒林外史》—小说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4607 号

责任编辑:郭 静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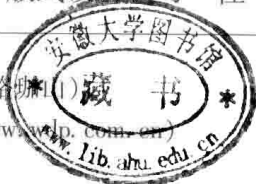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8.75 字数:277千字 插页:2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084-5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现代视野下的《儒林外史》研究

(代前言)

吴敬梓生活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至乾隆十九年(1754)间,出身于“家声科第从来美”的大家庭里,是一位知识广博而又能思考、有见解的读书人。他创作的《儒林外史》是一部有思想的、理性的小说。这部小说成书不久,就受到朋友的关注和读者的欢迎,程晋芳作《吴敬梓传》就说“人争传写之”。至于近代,因《儒林外史》的影响,更相继产生了一批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作品。其间也有诸多对《儒林外史》的评点和序跋等。据李汉秋辑录知,《儒林外史》的评点即有卧闲草堂本评语、齐省堂增订本评语、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中天目山樵评语、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萍叟评、潘祖荫评、华约渔评、石史评、平步青评、黄小田评、则仙评等。这些评点和序跋构成了现代《儒林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进入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社会后,《儒林外史》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在采取的形式上和运用的理论方法上,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式上,改传统的评点为现代的论文论著;研究的理念、方法上,改传统的以感悟体验为主而为运用现代文艺理论作系统的分析论证。在现代视野下,人们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以不同的眼界、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取不同的侧重做了很多研究,《儒林外史》在思想与艺术方面的价值、意义、内涵等不断地被发现与发掘。综观20世纪初以来《儒林外史》研究的进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为自发与分散研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为倡导与集中研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为自主与多元研究期。

一、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 自发与分散研究期

20世纪10年代，以新文化运动人物对《儒林外史》所作的评论为开端，《儒林外史》的研究从传统形态进入现代形态，具有了现代视野。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环节的“文学革命”，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追求，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促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加快取代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的评论，都具有了迥异于传统的眼界。更重要的是，钱玄同、胡适等发现了《儒林外史》对于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价值，多次通过评论吴敬梓和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为倡导白话文、倡导新文学呼喊。自此为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自发地对《儒林外史》的意蕴与现代价值进行研究与发掘，是为以现代视野观照《儒林外史》的自发与分散研究期。由关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以现代文学观念观照《儒林外史》的“新文学”意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特征，而以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胡适《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等为代表。

在这一阶段，《儒林外史》的评论与研究以新文化运动人物为主。钱玄同、胡适、鲁迅等人自发地运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发掘《儒林外史》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特点。由此提出或特别讨论了诸多在《儒林外史》现代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命题，如吴敬梓与颜李学派、《儒林外史》与科举、《儒林外史》与礼教、《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等。还有一些后来引起学界关注或争论的问题，也可追溯到这一时期，如吴敬梓的父亲问题、吴敬梓“辞征辟”的问题等。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无论在问题的发现或提出上，还是论点的确立与论证上，都奠定了《儒林外史》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根基。

更重要的是,钱玄同、胡适、鲁迅等评论《儒林外史》时,彰显出以小说文本为根本、重在揭示、持论中允的学术品格。例如,科举在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物那里,应当在反对而非提倡之列,但在评论《儒林外史》这样一部与科举密切相关的小说时,他们并未借评论《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只说吴敬梓“能够讪笑举业”。鲁迅也只说“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尤其胡适对科举多有指责,但在《吴敬梓传》中也只说,“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胡适的这一评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提出《儒林外史》批评的是“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而非直接说《儒林外史》批评科举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说《儒林外史》反对科举制度,不如说反对八股取士更妥当。一定意义上,这可视为向胡适看法的回归。二是提出《儒林外史》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乃在“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故此,胡适在《吴敬梓传》中紧接着提出,吴敬梓“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其对《儒林外史》科举内容的把握也各具卓识。不止面对《儒林外史》与科举的问题如此,面对《儒林外史》与礼教的问题也是如此。以鲁迅的评论为例。鲁迅对待礼教的态度十分鲜明,不时将投枪和匕首毫不留情地掷向伪善丑恶的道德家们,但在评论《儒林外史》时,对于“徽州府烈妇殉夫”一节,鲁迅并没有就此大做文章,抒发其反映礼教残害妇女的意旨,然后再严厉痛斥一番礼教,也没有据此得出《儒林外史》反对礼教的结论,而只论其“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论其“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

在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考证方面,这一阶段也成果丰硕。特别是胡适努力搜求文献资料,撰成《吴敬梓年谱》,为吴敬梓的身世、生平等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涉及“思想”及“思想的影响”的考证时,胡适的考证是存在问题的。例如胡适对于吴敬梓与颜李学派关系的考论,由吴敬梓与“颜李学派的信徒”程廷祚是至

交，即直接说吴敬梓“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由《儒林外史》所写几个人物的原型与颜李学派有密切关系，即直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宣扬颜李学派的思想的小说”；及至后来又断言“吴敬梓是颜、李学派的信徒”。明显地，胡适在证据并未充足、论证时逻辑尚不周密的情况下，就“大胆”地做了结论。正如陈文新在《红楼梦的现代误读》中所论，胡适的“科学方法”“一旦涉及思想和艺术的阐释”，“就难以有其用武之地”。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儒林外史》研究主要的新的特征，吴景贤《吴敬梓及其社会观》与王璜《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等为代表；同时，对《儒林外史》做文学的研究也出现新的成果，以何碧清《读〈儒林外史〉》与张天翼《读〈儒林外史〉》等为代表。

钱玄同、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人物研究、评论《儒林外史》，重在发现其“新文学”的意义，显然是将其作为文学文本来对待的。20世纪30年代，《儒林外史》的评论与研究出现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即将《儒林外史》主要作为认识社会历史的文本来对待。吴景贤《吴敬梓及其社会观》就直接提出，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描写的技术，而是在它的社会意义”，“我们对于文学的新估量，当然要尽量地排除旧的观念，不能再墨守过去的成见，抹煞了有价值的作品，所以论起安徽的文献，便应该把皖南徽州朴学，皖中桐城文章，和皖北全椒文学，三者并举，互相媲美，才算适当”。文章也正是把《儒林外史》主要作为社会历史文献，并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吴敬梓的社会观的。王璜《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更是开篇就提出，“《儒林外史》，虽然讽刺的是智识阶级的迂儒、腐士、假名士……实际是在抨击当时社会制度的不良。它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政治的，而不是艺术的”。同年发表的《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是强调“文艺的功利性”和“政治性”，并以此作为评论《儒林外史》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视角。对社会历史及政治内容的关注成为之后《儒林外史》评论与研究中的重要方面。而王璜《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着重提出并论证的吴敬梓“民族主义思想”问题，也成为吴敬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并在学界引起多次

争论。

这一阶段也有揭示《儒林外史》作为文学文本，对其中的一些人物或情节表现出的意义等做细致入微的论析的文章。如，何碧清发表于《学生文艺丛刊》1934年第8期的《读〈儒林外史〉》，对《儒林外史》的主旨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从《儒林外史》全篇中看来，其中的主旨不外说，自己的本体才是人生的主脑，一切的事情都要自己来支配。这一件事，我自己认为是合理的，我就做去，无论别人反对到如何程度，我也做去。本体受着外事的支配，人生就失了价值了。”由此，文章这样论吴敬梓：“不为外物所支配的吴敬梓，他以为贪图富贵，非但不能荣宗耀祖，而且还要伤了自己的本体，使自己失却了人生的主脑。”文章还论吴敬梓的人格显出三个特点：“第一，他是超脱了功名势利；第二，他是摆脱了理教的束缚；第三，他不以俗人的行动为行动。”文章论《儒林外史》的社会背景时，则提出《儒林外史》“是很纯洁的社会小说”，由吴敬梓的描写，可以确定“《儒林外史》时代的社会是一个利禄熏心势利刻薄的社会”。论《儒林外史》却不涉科举、八股、礼教、讽刺等常谈话题，而又能从文本出发合理揭示《儒林外史》所蕴含的意义，是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张天翼《读〈儒林外史〉》也立足于小说文本，评论其“自然主义”写法、书中各色人物的意义以及创作的得失等。还有碧晖《讽刺小说和〈儒林外史〉》对《儒林外史》“冷的讽刺”、“写实”特征及其体现出的作者“超然的勇敢的精神”等进行了揭示。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倡导与集中研究期

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进步艺术的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日渐受到重视。1954年又恰逢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随之而受到集中关注。中国作家协会还为此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主持并致开幕词，亦着重阐述吴敬梓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的现实主义”

“杰作”。由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众多知名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纷纷撰写文章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进行评论与研究。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儒林外史》的评论与研究热度骤减，但仍有文章发表。在这一时期，研究的缘起、研究的数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乃至具体的观点都明显地体现出倡导与集中的特征。这一时期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以“现实主义”观照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是这一阶段主要的新的特征，而以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及何满子《论〈儒林外史〉》等为代表。从文章发表时间上，这一阶段又以1954年、1955年最为集中。

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是以揭示吴敬梓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内容贯穿全文，着重论述了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身世经历，与思想渊源——“明末清初许多爱国主义先辈大师们给他的思想影响”，《儒林外史》所体现的作者“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生根在这种严肃的现实主义上面”的讽刺艺术等，同时也指出“和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牟的”地方，并据此认为“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亦强调《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内容及特征。文章认为，“决定《儒林外史》的价值的”，是“他的尖锐的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的批判，他的可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和他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的成就”；“《儒林外史》的题材和它着重从这些方面来批判封建社会，使它在中国古代的为数很少的几部最为杰出的白话长篇小说中具有独自的特色、独自的成就，而它就以它的这种特色和成就来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文章还强调《儒林外史》讽刺的“现实主义”特征，提出“对于否定人物和否定现象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就是讽刺”，“在现实主义以外，别无讽刺”。何满子《论儒林外史》亦论，吴敬梓“完成了一幅当时社会的相当全面的、真实的、深刻的风俗画。他‘用记述风俗的方式’，‘给予了我们一部……社会底极堪惊异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其他如姚雪垠《试论〈儒林外史〉的思

想性》、陆侃如《略论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程千帆《〈儒林外史〉试论》、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吴小如《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马茂元《〈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张慧剑《〈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冯至《论〈儒林外史〉》、胡念贻《吴敬梓和他的时代》、范宁《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等，都以“现实主义”对《儒林外史》进行观照、阐释，并由此高度评价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

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以“现实主义”进行观照并阐释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具体则由对“反科举”、“反八股取士”、“反功名富贵”、“反理学”、“反礼教”、“反封建”以及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或“民族思想”之类命题的阐发而展开，不管是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讨论还是对其艺术的论析皆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研究千篇一律，无甚可观。相反，这一阶段，研究者或因丰富的创作经验，或因深厚的学养，总能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下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做出深刻的论析，且颇多识见。如吴组缃对《儒林外史》所使用“史笔”，或“皮里阳秋”的表现手法的论析，对其结构形式所作的“连环短篇”的概括，皆堪称独到；何其芳对《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肯定人物”充分重视，称之“差不多和那些因为热衷功名富贵而精神空虚以至精神堕落的人物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相当”，诚恰如其分；何满子论马二先生，就说他是吴敬梓“带着爱心写的”，“肯将自己的束脩倾囊解救蘧公孙的灾祸的肝胆相与的热肠君子”，亦深合作者为文之心；等等。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儒林外史》及其评论的“现实斗争”意义得到发明与张扬。与20世纪40年代相较，王璜的《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等三篇文章，尚意在以“文艺的功利性”和“政治性”的立场阐发《儒林外史》的内容，而这一阶段评论《儒林外史》则已日渐变为现实斗争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一阶段的《儒林外史》评论已严重偏离正常的学术研究，但其间所形成的论点在之后还是引起了讨论与反思，故仍于此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适对于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诬蔑》、《斥胡适对〈儒林外史〉的诬蔑》等文章开始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研究对《儒林外史》“现实主义”的“歪曲”和“贬抑”。20世纪

80年代开始，对胡适的严厉批判渐渐得到改变，胡适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也逐步得到肯定。对胡适研究《儒林外史》进行批判稍后，陆侃如《略论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程千帆《〈儒林外史〉试论》、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姚雪垠《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何满子《论〈儒林外史〉》等也开始因“掉进了企图使文学艺术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泥坑”等“错误”而受到批评甚至批判。20世纪70年代，《略论〈儒林外史〉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读〈儒林外史〉》、《谈〈儒林外史〉的反儒思想》、《对儒家教育的形象批判——读〈儒林外史〉》、《评论〈儒林外史〉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批判儒家教育思想的生动材料——读〈儒林外史〉》等文对“反孔”、“反儒”、“丑史”说的发明，则将《儒林外史》的“现实斗争”意义推向极端。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丰家骅《〈儒林外史〉“反儒说”质疑》、任访秋《反儒软？尊儒软？——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等文对“反儒”、“丑史”说等进行质疑和反思。

这一时期的《儒林外史》研究与评论，成绩固然不少，不能否定，但问题也不能忽视。黄霖为周兴陆《吴敬梓〈诗说〉研究》所作的序中谈到学术研究的“守旧与趋时”问题时所说的话，或许是回顾这一时期的《儒林外史》研究与评论时，应该首先认识到的，他说：“守旧固然会落后，但趋时未必一定就先进。风云际会……自以为跟上了时代，其实并没有脚踏在实地。有的人一时尽管可以因此而得名，但冷静下来看看，总觉得实实在在的东西少了点，虚浮空泛的东西多了些。时过境迁，一时所谓‘先进’的东西，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 自主与多元研究期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一，研究多缘于对问题的发现或基于解决具体学术问题的目的，体现出明确的问题意识；其二，研究的视野、方法、角度渐趋多元，论点也随之不断有创变；其三，对20世纪初以来的研究

开始了自觉的回顾与反思；其四，立足于文本及语境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其五，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互相争论，使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认识得到拓展并引向深入。是为自主与多元研究期。这一时期亦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重视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引入新理论或新视角观照《儒林外史》为主要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陈美林即开始发表《吴敬梓身世三考》、《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吴敬梓修先贤祠考》、《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等文章，对吴敬梓身世、生平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专题探讨，不再是从作者到作品、从思想到艺术、从结构到讽刺都要去兼顾的综论。谈凤梁、任访秋、房日晰、白鸿、朱泽吉等也开始发表文章对《儒林外史》研究中的某一命题或观点进行专题反思与讨论。而20世纪80年代初为始，《儒林外史》的研究更加呈现出问题、论点的多样性，研究方法、观照视角等也渐趋多元。例如，陈美林特别关注“影响”研究，继论证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之后，又不断发掘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创作所受到的来自诸如六朝风尚和文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其《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对〈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不同评价》则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作了回顾与反思，认为《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有待于研究者根据作品本身进行艺术分析从而概括出来”。再如，李汉秋以“魏晋风度”观照吴敬梓，认为他“不仅继承了，而且发展了阮嵇的叛逆精神和民主精神”；以“批判现实主义”观照《儒林外史》，提出其在“创作方法”上“展露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运用“结构原则和系统分析方法”探求《儒林外史》的深层结构，提出《儒林外史》具有“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两类人分居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又如，傅继馥《〈儒林外史〉喜剧形象的划时代成就》、房日晰《论〈儒林外史〉对喜剧形象的描写》等则以“喜剧”理论分析《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刻画特色和讽刺艺术特征。又如，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儒林外史〉的实践》、《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平慧善《从美学角度看〈儒林外史〉》等以“美学”视角观照《儒林外史》，论析了《儒林外史》的美学特征，评述了其在

中国小说美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又如，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由对《儒林外史》“纪历”等的分析探讨了《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和创作过程问题。又如，章培恒由对《儒林外史》故事发生时间的规律的考察，论证了《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的结论。又如，杜贵晨从对“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论析入手，提出《儒林外史》的结构是“一意贯穿，通体血脉相连的”；陈文新《从传统的致思途径看〈儒林外史〉结构的完整性》则从“中华民族传统的致思途径的特殊性”，认识《儒林外史》所体现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家特有的整体观念”，指出，《儒林外史》的创作并非缺乏通盘的计划或考虑，而是通过“‘楔子’的笼罩全局的作用”、“数字暗示”、“深层布局”等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悲剧世界”。还有，邓韶玉《吴敬梓思想论纲》中以“原始儒学”观照吴敬梓，认为其秉承儒学家风，浸染复古色彩，在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认识论上都体现出“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成为他向往的理想”；等等。

显而易见，这一阶段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此前未有的新面貌，如所研究的问题大多比较具体，研究的视角不再单一，对文本及语境的分析更加细致等。但这一阶段的研究也显示出 20 世纪初以来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话语的强势，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以外来的文学观念、理论方法观照《儒林外史》成为习惯，而以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观照《儒林外史》却很少见。研究《儒林外史》，揭主题、论思想、析人物形象、评情节结构、谈创作方法、说讽刺艺术等成为习见模式，并总是或显或隐地以主题鲜明不鲜明，思想深刻不深刻，结构完整不完整，人物形象典型不典型，创作方法先进不先进等标准来衡量、评价。很多问题的讨论也总会归结到这些上面，比如吴敬梓辞征辟、吴敬梓的父亲问题、创作方法的讨论等都是如此。也正因为此，对主题鲜明、思想深刻、人物典型、创作方法先进等观念起重要支撑作用的“反科举”、“反八股取士”、“反程朱”、“反礼教”、“反封建”及“民主主义思想”等话语被一再复述、阐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数不算少的文章如果抽去这些被一再复述、阐论的“话语”内容，几乎只剩下一个方法或视角的“壳”。这表明，继续以外来的文学观念、理论方法观照《儒林外史》

已经很难再有实质性的新的创变，姑且不论仅如此观照《儒林外史》能否读“懂”的问题。此时，已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从而将目光转向中国固有的文化文学传统，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文化研究、叙事研究、文体研究、研究史回顾与反思等则成为主要的新的特征。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观照进而探讨《儒林外史》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蕴、文化特征、文化渊源、文化沿革、文化追求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如王平《〈儒林外史〉：文化反思与整合的艺术显示》认为，吴敬梓在作品中“对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最终理想”是试图恢复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的统一。张锦池《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社会观念的比较研究》认为“作者机锋所向”“是整个现实仕途经济和世态人情，并以其特有的文化反思性质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穷极文士情态’”；其《论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国”——说〈儒林外史〉的思想性质及其文化沿革》则指出，“吴敬梓的文化、哲学精神是比较单纯的，与释道二教思想几乎没有甚么瓜葛，主要是继承了儒学的原教旨及其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合理内核而一炉铸之”。李汉秋《〈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等文提出并探讨了“儒道互补”说，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形象“是儒道合掺互补的产物，兼具真儒士、真名士的精神品格”，“体现了儒道互补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则提出，“十八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转折的动力之一，来自儒家礼仪主义对宋明儒学的反馈和批评”，而吴敬梓“对十八世纪思想文化转折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小说叙述的形式呈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儒礼，即二元礼和苦行礼，并且揭示了它们各自的动作机制和后果”；并“通过形象、比喻、情节的构造和展开，以及作品叙述的内部关系来呈现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张国风《雅俗之辨与〈儒林外史〉的隐性评价体系》则经由对雅文化、俗文化特征及分合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儒林外史》褒贬人物的标准在儒家伦理规范之外，“还有一个隐性评价体系，即雅俗之辨”，因吴敬梓熟悉六朝之典故，

欣赏魏晋之风度，“他心中的雅俗之辨必然异常强烈”，小说中对于人物的描写与设计，即“反映出吴敬梓在经历了由富而贫的经历以后对雅俗之辨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一些原有问题的研究由于从传统文学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而获得了新的认知。如陈文新《士人心态话儒林》在对科举文化有深入把握的基础上，突破了“反科举”、“反八股取士”等现代习见话语模式，以“了解之同情”的眼界，对《儒林外史》的创作意旨等做出了独到的阐释。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儒林外史〉结构新探》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完全符合古代美学家所追求的‘凤头’、‘猪肚’、‘獭尾’那种理想的结构艺术美”。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对《儒林外史》进行观照是这一阶段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如陈文新《士人心态话儒林》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文学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的同时，合理引入西方的叙事理论，致力于中西会通，对《儒林外史》的人物、情节、叙事意图、叙事效果等做出了独具慧眼的解读。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认为，《儒林外史》具有“不同凡响的时空操作和叙事谋略方面的智慧”：“百年反思的时间意识，左右着小说观照八股取士制度下士绅社会的独特视角”，“使叙事者辛辣地嘲讽了在科举仕途中未曾‘看得破’的同行者，而又在‘百年易过’的历史行程中自省到这种嘲讽的无可奈何”。吴光正《〈儒林外史〉的宗教叙事与士风描写》认为，“吴敬梓利用传统的儒家政治神话、道教降凡神话以及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成功地建构了《儒林外史》的叙事框架，并传达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情感诉求”。关注《儒林外史》的文体特征、文体渊源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另一重要特征。如宁宗一《从小说文体演变看〈儒林外史〉》，致力于把握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认为《儒林外史》的反思性使得它“具有了思想家的小说的美学品格”。萧相恺《抨击日下世风、探索士子人格建构的书——也谈〈儒林外史〉的主题》基于“世情小说”发展史的考察，对《儒林外史》的题材特征进行了探讨。朱万曙《〈儒林外史〉：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说》对小说的“理性特征”进行了讨论。王进驹《〈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认为，《儒林外史》的文体渊源可追溯到《世说新语》，“吴敬梓在汲取《世说新语》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之同时，把《世说新语》的文体因素融化到白话小说的创作中，使《儒林外史》的小说文体呈

现出独特的风貌”。重视对研究史进行回顾与反思也是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而以陈美林主编《〈儒林外史〉研究史》、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纵览》等为代表。对《儒林外史》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为在传承之上求创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启示了研究的方向。

这一阶段有一些此前研究的问题也继续受到关注，得到进一步探讨。如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等对《儒林外史》结构的探讨，赵宽熙《〈儒林外史〉是讽刺，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等对《儒林外史》创作方法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等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争论等。李汉秋对《儒林外史》评语进一步搜集整理，周兴陆对《文木山房诗说》的发现与整理，李汉秋等对吴敬梓诗词赋文的系年校注等文献整理工作，则为研究《儒林外史》进一步构建、完善了相关文本及其语境。

综之，现代视野下的《儒林外史》研究，因着不同的时代总体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运用、新视角的选择、新观点的形成等，往往是在对既有评论与研究作认真回顾与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回顾与反思更是成为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呈现出自主与多元局面的重要因素。《儒林外史》研究继续实现新的突破，传承中求创变应当是一个路径，而回顾与反思也就应当是需要做的一项工作。这也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初衷之一。

目 录

| | |
|---------------------------|----------|
| 现代视野下的《儒林外史》研究(代前言) | (1) |
| 近百年《儒林外史》经典论著 | (1) |
| 吴敬梓传 | 胡 适(3) |
| 【评 介】 | (8) |
|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 | 鲁 迅(21) |
| 【评 介】 | (25) |
| 读《儒林外史》(存目) | 张天翼(34) |
| 【评 介】 | (34) |
| 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存目) | 王 璜(41) |
| 【评 介】 | (41) |
| 《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存目) | 吴组缊(52) |
| 【评 介】 | (52) |
| 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存目) | 何其芳(61) |
| 【评 介】 | (61) |
| 论《儒林外史》(存目) | 何满子(68) |
| 【评 介】 | (68) |
|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存目) | 何泽翰(76) |
| 【评 介】 | (76) |
| 吴敬梓身世三考 | 陈美林(82) |
| 【评 介】 | (95) |
| 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存目) | 刘世德(107) |
| 【评 介】 | (107) |
|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 李汉秋(114) |
| 【评 介】 | (122) |